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

贸易环境不确定背景下促进 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研究

项目结项报告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2023年2月

目录

图表目录	3
一、报告摘要及关键词	4
二、报告正文	5
1. 研究计划执行情况概述	5
2. 主要研究内容	6
2.1 研究内容一：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6
2.1.1 对外贸易及区域经济发展：文献回顾	7
2.1.2 对外贸易及区域间发展：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果	9
2.2 研究内容二：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创新支持行为的影响。	15
2.2.1 对外贸易及政府行为：文献回顾	16
2.2.2 对外贸易及政府行为：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果	17
2.3 研究内容三：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合作行为的影响。	21
2.3.1 对外贸易及政府间合作：文献回顾	22
2.3.2 对外贸易及政府间合作：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果	23
3. 研究工作主要进展与结果	28
主要研究进展及结果方面	28
关键数据积累	29
研究价值	29
4. 存在的问题、建议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30
5. 参考文献	30

图表目录

图 1 我国城市化变化趋势	8
图 2 百万人以上城市的地理分布	8
图 3 对外贸易及城市化发展趋势.....	9
图 4 贸易冲击与区域经济发展：平行趋势假定.....	11
图 5 贸易冲击与区域经济发展：贸易依存度.....	12
图 6 贸易冲击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模.....	13
图 7 贸易冲击与城乡收入差：动态作用.....	15
图 8 美国和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变化情况.....	16
图 9 贸易冲击与政府行为：平行趋势假定.....	19
图 10 区域创新创业水平与贸易冲击.....	20
图 11 市场化水平与贸易冲击.....	21
图 12 贸易冲击与地方政府间经济合作：平行趋势假定.....	26
表 1 金融危机与城市化增速.....	10
表 2 贸易冲击与城市化：作用机制.....	14
表 3 贸易冲击与政府创新支持政策.....	18
表 4 贸易冲击与地方政府经济合作.....	24
表 5 贸易依存度高省份主动寻求的经济合作.....	26
表 6 贸易冲击与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内容.....	27

一、报告摘要及关键词

摘要：

在当前保守思潮复兴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所经历的多次贸易冲击将在长远上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外部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只有在内部通过统筹推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才能有效缓解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实现则与地方政府行为紧密相关，然而现有文献对于政府相关行为视角的考察仍然不足，且将量化的具体经济效益纳入考量范围无疑有助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效率。因此，廓清这些贸易冲击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对贸易冲击的应对行为等问题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及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包含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两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试图检验对地方政府对于创新支持行为以及政府间合作行为的影响并量化其经济效益。课题中建立了县级区域经济发展数据集、地级市政府创新支持数据集及省级政府间合作数据集。

基于以上数据，本课题完成了三个目标：第一，检验贸易冲击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课题发现贸易冲击使城市化增速降低了 0.44 个百分点，就作用机制来说，贸易冲击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减少就业机会来影响城市化率；第二，量化地方政府面对贸易不确定时的创新支持行为。本课题发现高贸易依赖度地区的政府创新支持的力度在冲击后比低贸易依赖度地区高出 35.94 个百分点，其中促进企业改制以建立良好的软件制度保障以及直接对企业进行创新补贴是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危机促进创新所采用的主要措施。第三，检验我国省级政府间合作在应对贸易不确定时的作用。本课题发现贸易冲击显著促进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的省份间开展经济合作，该作用主要由贸易依存度较高省份的合作积极性提高所驱动，且主要是通过加强国内贸易而非是实现产业转移方面的合作。

关键词：

贸易；金融危机；政府创新支持政策；政府间合作

二、报告正文

1. 研究计划执行情况概述

(1) 按计划执行情况。

课题获批立项以来，课题负责人及全体成员高度重视，按照获批的研究计划稳步推进相关研究的全面展开。在保证既定预期成果顺利完成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根据各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有针对性地在课题执行中加强薄弱之处的分析，以期高质量地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总体而言，在过去两年面临新冠疫情的情形，研究团队依据课题的研究计划在紧张而充实的科研工作中落实了各阶段任务的完成。以下是各阶段的具体情况总结：

2021年8月至11月，进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以及全国地市县统计资料的电子化工作，完成贸易依存度数据的清洗整理工作；安排课题组成员重点搜集整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支持与政府间合作表述的具体落实情况。

2021年12月至次年2月，收集、整理和合并构建了地级市政府创新支持数据集及省级政府间合作数据集；完成全部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完成地理空间分布后同课题组成员进行第一次全体讨论，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

2022年3月至11月，完成论文《Trade Shocks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County-level Data in China》并投稿至 *China Economic Review*；完成实证分析，课题组进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研究发现；撰写阶段性研究成果《负面经济冲击与公共政策传导：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视角》与《贸易冲击与区域合作：以地方政府为视角》初稿，在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陈述论文并获得修改意见。

2022年12月至次年2月，《负面经济冲击与公共政策传导：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视角》投稿至《中国经济问题》进入外审修改阶段，进行论文修改；将论文《Trade Shocks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County-level Data in China》投稿至 *Applied Economics*；系统整理前期实地调研、课题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撰写结项报告。

(2) 研究目标完成情况。

整体来说，课题既定研究目标已基本完成。所有已完成论文在投稿时均明确标注受到 CIDEG 项目资助。

1. 《Trade Shocks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County-level Data in China》，学术论文。该文综合利用微观企业与县级经济数据，通过每个县域内工业企业的出口数据构建出该县的贸易依存度，从而识别贸易对于城市化的作用以廓清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目前处于 Applied Economics 外审阶段；
2. 《负面经济冲击与公共政策传导：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视角》通过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上探究了当外部的负面经济冲击发生时地方政府官员的内在激励影响公共政策实施的传导渠道，揭示出中国式产业政策落实的内在机理。目前处于《中国经济问题》外审阶段。
3. 《贸易冲击与区域合作：以地方政府为视角》旨在量化面对外部贸易不确定情形的贸易冲击下，地方政府间合作行为的变化，并试图提供相应的定性证据。该文目前仍在投稿中。

2. 主要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金融危机及贸易冲击对我国国内区域经济格局会带来重要影响，本课题首先尝试量化这样的贸易冲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为缓解其不利影响，考虑到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地方政府对贸易冲击的应对行为不可忽视。在外部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只有通过统筹推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才能有效缓解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而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实现则与地方政府行为紧密相关，由此，接下来需要我们廓清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行为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首先从宏观层面，我们研究贸易冲击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同时根据此研究结果，我们进一步探讨贸易冲击对单个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两项研究成果，我们还检验了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影响。以上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三个子项目。通过对子项目的合作研究来探讨金融危机及贸易冲击对我国国内区域经济格局带来的重要影响。以下将对各个子项目的研究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2.1 研究内容一：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当前保守思潮复兴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形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比如，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以及欧盟各国也针对中国产品出台一系列限制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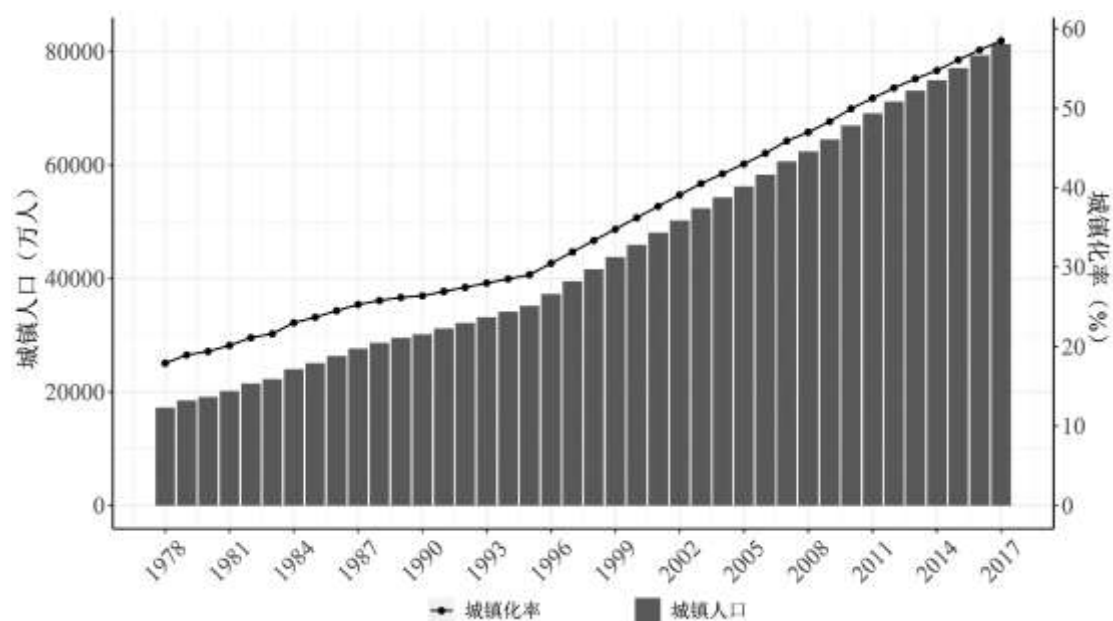
施。在贸易环境不确定下所经历的多次贸易冲击将在长远上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其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发生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及贸易冲击对我国国内区域经济格局会带来重要影响，那么这样的贸易冲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我们第一个子项目研究的重点，本节剩下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介绍对外贸易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与相关文献，然后介绍子项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

2.1.1 对外贸易及区域经济发展：文献回顾

2.1.1 节将从两个方面介绍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1）城镇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本项目从中国城市化率视角出发对中国城市化发展作简要回顾；（2）在 2008 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介绍对外贸易冲击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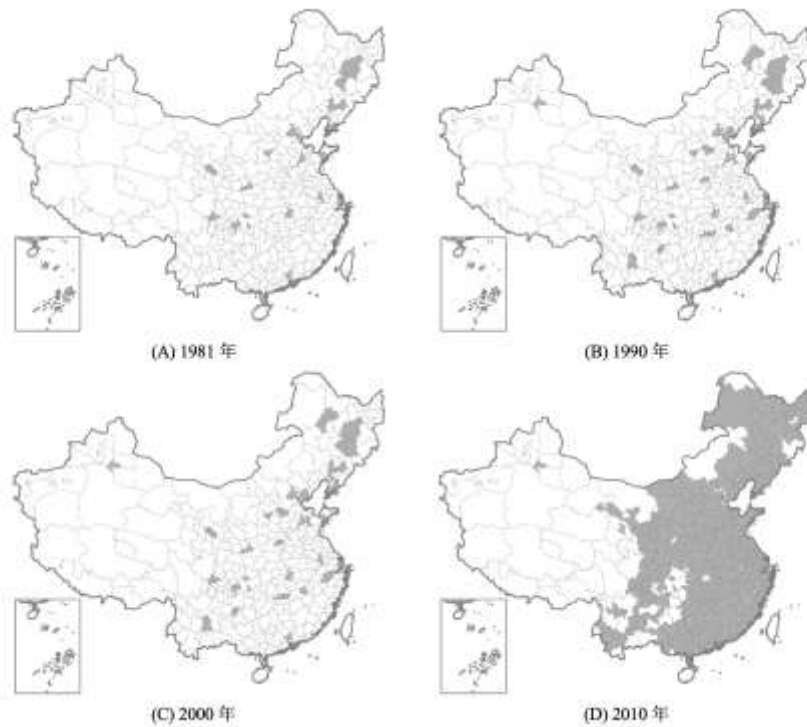
（一）区域经济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率

中国在开放政策之后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1978–2017 年，城市人口从 1.7 亿人增加到 8.1 亿人，城镇化率从 17.9% 提升到 58.5%。图 1 展示了城市化发展趋势。同时，城市数量也大幅增加。相同时期内，中国城市数量从 193 个增加到 658 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地级市由 1978 年的 29 个增加到 2016 年的 147 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地级市在 1978 年尚不存在，到了 2016 年已出现 6 个。图 2 展示了百万人口以上地级市的地理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1 我国城市化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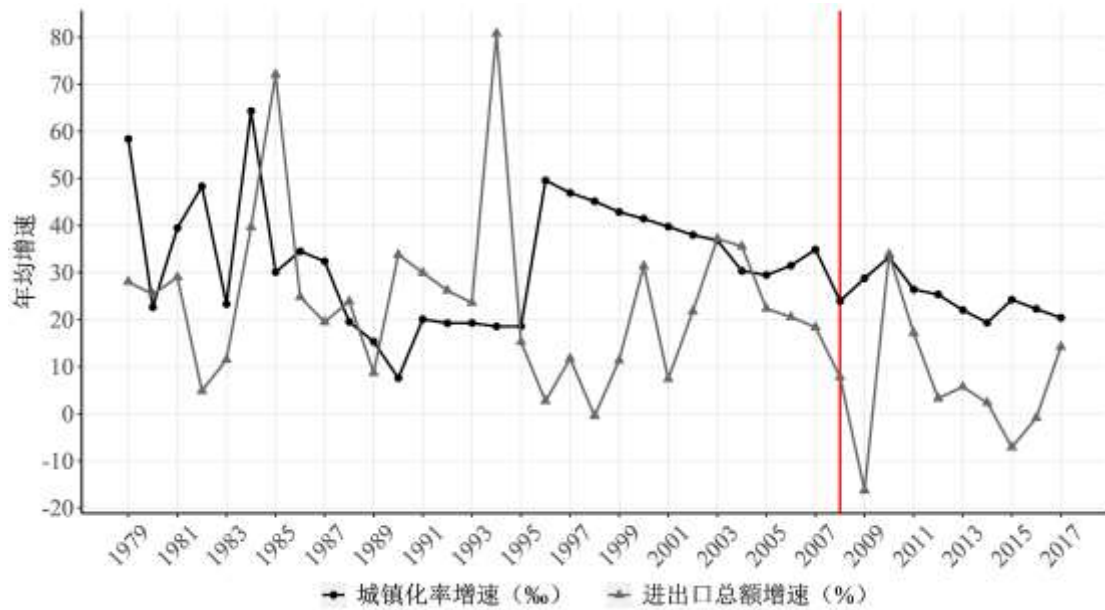
说明：图中灰色标识出的城市为人口超过 100 万的地级市。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 2 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地理分布

（二）中国的对外贸易及 2008 年金融危机

不管是贸易总量还是贸易结构，中国的对外贸易同样都经历了迅速发展。197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 206 亿美元，所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不足 1%。之后的贸易量以每年 14.65% 的速度增长，到 2017 年，货物总额已经达到 42533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众多研究发现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Lardy, 1995; Liu et al., 2002; Yao, 2006）。但中国的对外贸易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显著的下降：就贸易总量而言，2009 年的进出口总额相比上年下降了 16%；从贸易增速看，2008 年后的进出口额年均增速仅为金融危机前的四分之一左右，直到 2010 年后才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速水平（国家统计局，2018）。中国受到贸易冲击幅度远大于全球贸易量平均下降水平 12%（Chor & Manova, 2012）。图 3 绘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城市化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这两个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说明：红色竖线表示 2008 年金融危机。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3 对外贸易及城市化发展趋势

2.1.2 对外贸易及区域间发展：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

(一) 基准模型

子项目选取“2008 年金融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8 年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冲击克服国际贸易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宏观层面上考察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实证部分将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 来检验贸易外生冲击对于城市化的影响，模型设置如式 (1)：

$$Growth_{i,t} = \alpha + \beta High_i \times Post_t + \delt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i 代表第 i 个县， t 代表第 t 年。被解释变量 $Growth_{i,t}$ 为城市化增速，即 t 年与 $t - 1$ 年城市化率的差值。核心解释变量为交互项 $High_i \times Post_t$ 。 $High_i$ 为贸易依存度虚拟变量，如果县 i 的贸易依存度超过平均数则赋值为 1。这意味着 DID 设置中的介入组为高贸易依存县，低贸易依存县为控制组。 $Post_t$ 为金融危机虚

拟变量，2008年后赋值为1。向量 $X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工业化水平、城市人口规模、GDP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状况。 α 为截距项， $\varepsilon_{i,t}$ 为独立于解释变量的随机扰动项。 β 是我们关心的估计系数，它捕捉了贸易冲击对于城市化的作用且预期为负。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第(1)列仅考虑县和年固定效应。我们发现相较于贸易依赖度低的县，那些贸易依赖度高县在金融危机后城市化增速降低0.2%。在第(2)列中我们加入了一系列其他影响城市化的因素后，该交互项的系数大小增加了0.02并依然在10%水平上显著。由于不同地级市的变量可能有着不同的时间趋势，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交互项的系数在这种设置下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大小比第(2)列大47%左右。Henderson & Kriticos (2018)发现非洲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可贸易的服务业(Tradable Service)，这启发我们在第(4)列中加入该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虽然贸易冲击的负向作用依然存在但该控制变量并不显著。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可贸易服务业份额有限。¹在下面进一步的分析里，我们没有考虑服务业这一变量。

表 1 金融危机与城市化增速

城市化增速	(1)	(2)	(3)	(4)
<i>High × Post</i>	-0.220*	-0.243*	-0.363***	-0.436***
	(0.116)	(0.135)	(0.123)	(0.169)
工业化	0.250***	0.414***	0.380***	0.351***
	(0.067)	(0.075)	(0.074)	(0.046)
人口 (log)		11.346***	13.071***	23.092***
		(1.117)	(1.372)	(1.650)
GDP (log)		-0.560***	-0.573***	-0.117
		(0.177)	(0.216)	(0.308)
基础设施投资额 (log)		-0.052	0.011	0.087
		(0.077)	(0.090)	(0.105)
第三产业增加值 (log)				-0.061
				(0.166)
常数	-0.060	-39.044***	-2,858.898***	703.409***
	(0.118)	(4.100)	(588.433)	(163.713)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县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无	无	有	有

¹ OECD 的统计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额不足总出口额的 10% (OECD, 2018a, 2018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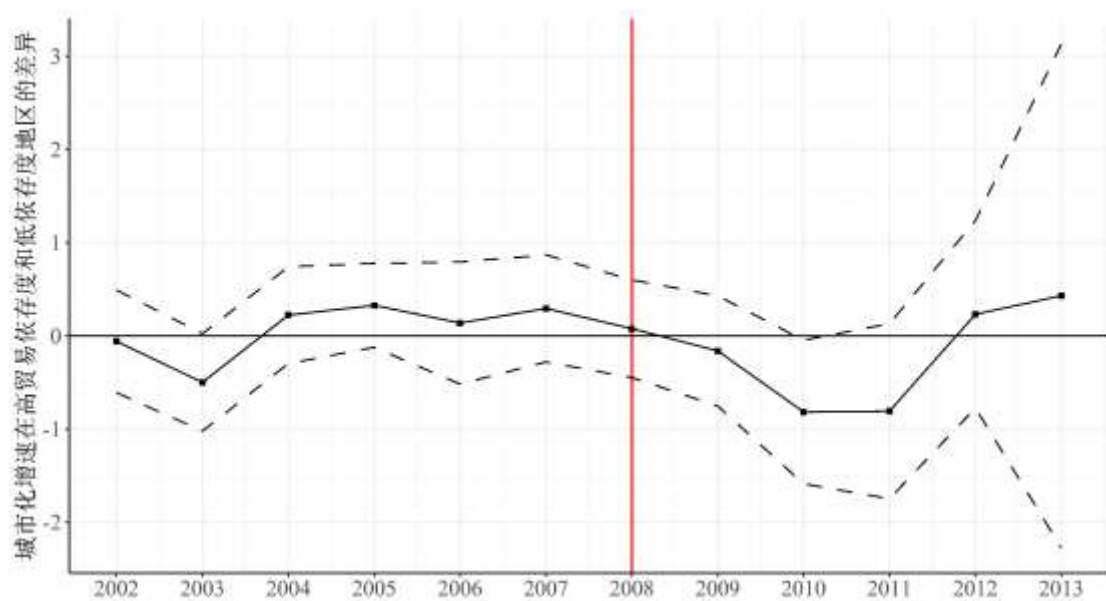
观察值	27,367	24,151	24,151	18,227
R ²	0.047	0.061	0.091	0.111

说明：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县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二）平行假设检验

上述 DID 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如果城市化增速的变化的确归因于贸易减少，那么在金融危机前贸易依赖度高的地区和低的地区应该不存在差异。为检验该假定，我们把贸易冲击逐年打开：将（1）中的 $Post_t$ 替换为贸易依赖度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这能够让我们检验两组地区在贸易冲击前是否存在差异，并且也可以观察到贸易冲击的逐年动态影响。

图（4）展示了 DID 估计结果高贸易依存地区的估计值及 95%置信区间。我们发现在 2008 年前贸易依赖度高和低的两组地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进一步说明 DID 设置的合理性。进一步的，图（4）还能反映出金融危机的动态影响：高贸易地区的城市化增速在 2008 年后开始显著小于低贸易地区，该影响大约持续了 4 年到 2012 年后才逐渐消失。



说明：图中横轴代表年份。实线是控制了县、年固定效应及地级市时间趋势之后的高贸易依存地区的估计值。虚线为上下 95%置信区间且标准误在县层面聚类。我们选择了 2008 年作为基准组并且加入了县、年固定效应及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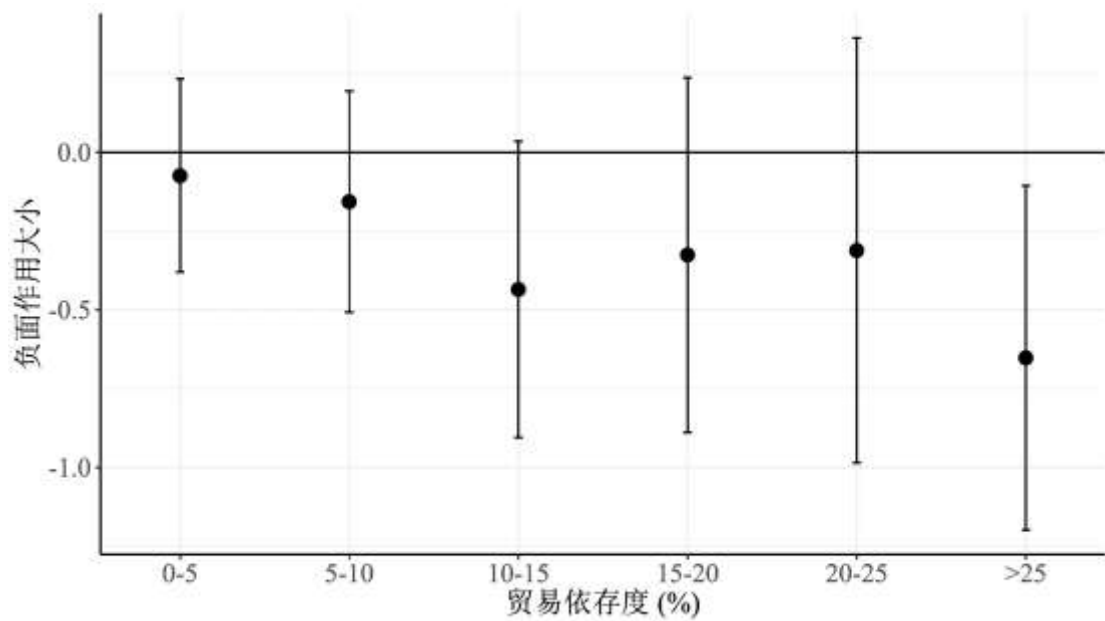
图 4 贸易冲击与区域经济发展：平行趋势假定

（三）贸易冲击作用的异质性

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异质性作用。本节分别从贸易依赖程度和城市规模两方面探讨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贸易冲击作用的异质性：贸易依存度

在基准回归中，对贸易依赖度简单的二值分类让我们无法进一步捕捉贸易冲击在不同地区的异质性作用，特别是如果作用是非线性的话。为此，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将贸易依赖度按 5% 间隔进行分组。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我们不需要提前假设金融危机的非线性作用到底是何种函数形式，只需要观察每组系数大小即可估计出贸易冲击的异质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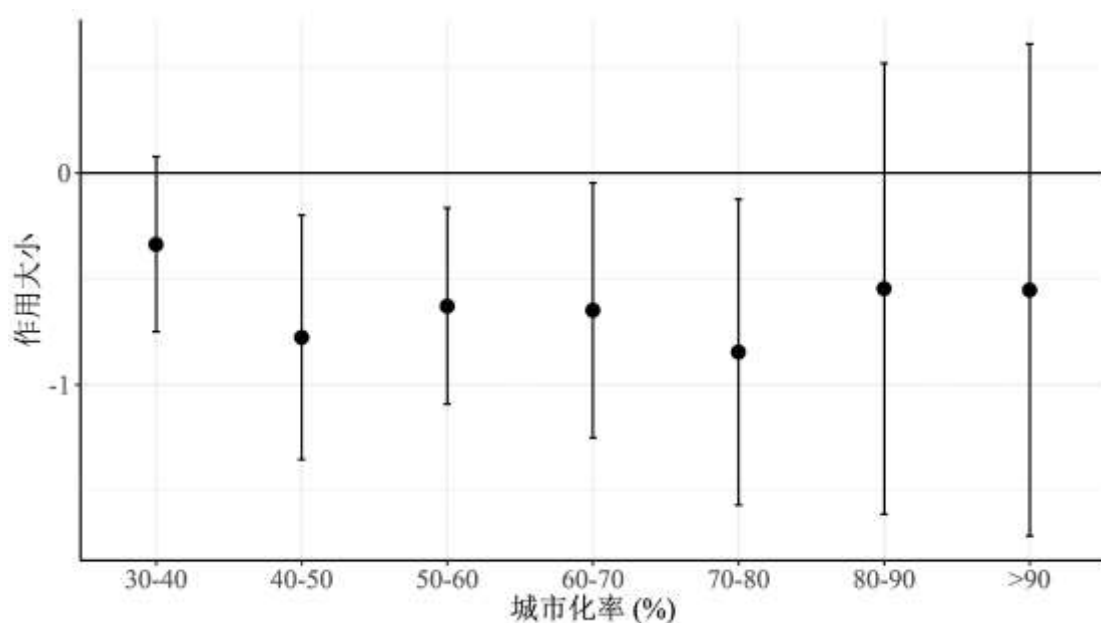
说明：圆点代表贸易冲击的点估计值，黑色竖线则代表 95% 置信区间。标准误在县层面聚类。

图 5 贸易冲击与区域经济发展：贸易依存度

图（5）展示了 DID 贸易冲击的估计值及 95% 置信区间。我们发现在 2008 年前贸易依赖度高和低的两组地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进一步说明 DID 设置的合理性。进一步的，图（5）还能反映出金融危机的动态影响：高贸易地区的城市化增速在 2008 年后开始显著小于低贸易地区，该影响大约持续了 4 年 2012 年后才逐渐消失。

贸易冲击作用的异质性：城市规模

Henderson & Kriticos (2018) 指出非洲的首位城市非常得益于贸易。那么当贸易降低时这些城市遭到的打击可能更大。我们想看看来自中国数据是否同样支持该预测。



说明：圆点代表贸易冲击变量的点估计值，黑色竖线则代表 95%置信区间。标准误在县层面聚类。

图 6 贸易冲击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模

图（6）中展示了城市化率与贸易冲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城市化率并未随着贸易冲击的出现而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城市区域结构和非洲有显著不同。中国的城市布局多以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为主（Desmet & Henderson, 2015）：首位城市能够辐射周边城市，这使得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差异没有非洲那样显著。以上差别也许可以解释贸易冲击的大小在不同城市间的差异就没有非洲那样明显。

（四）机制讨论

在一个国家内部，城市规模的扩大来自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移民。因此，当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时，城市化率会逐渐趋于均衡（Harris & Todaro, 1970; Krugman, 1991; Gollin et al., 2016）。由于贸易冲击降低了国际市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城市地区的外贸企业利润降低，最终导致工资率的下降。而农业部门由于所受冲击程度远低于工业部门，工资率大致不变。以上逻辑提供了贸易冲击可能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见表（2）。结果清楚地展示出贸易冲击仅降低了城市居民收入（第 2 列）但并没有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第 1 列）。相应的，贸易冲击最终缩小了 9% 的城乡收入差距（第 3 列）。以上结果显示，贸易冲击的确通过降低城市居民收入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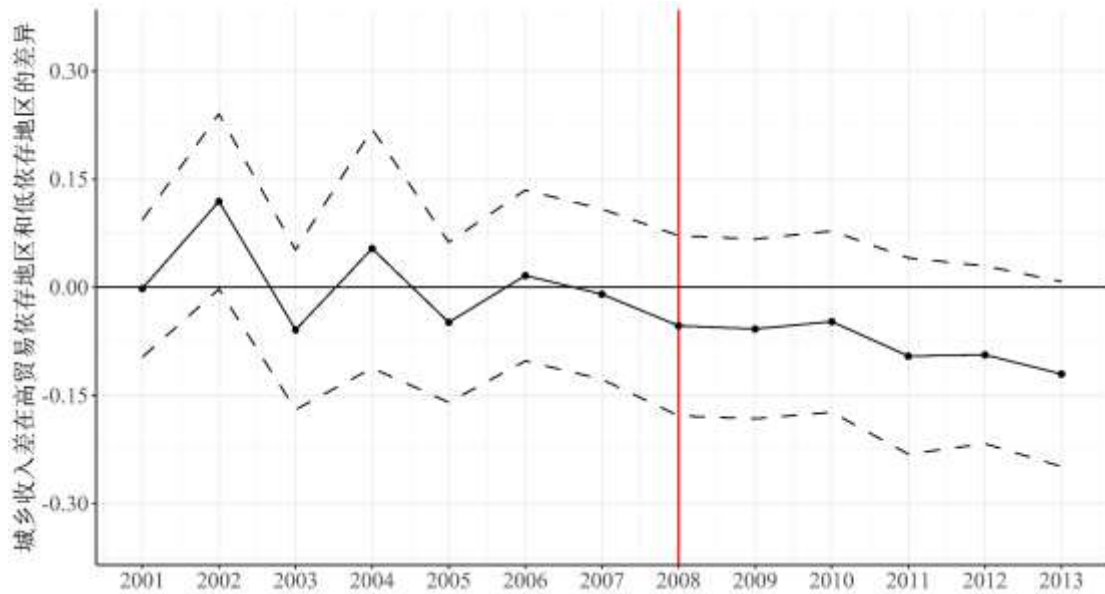
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表 2 贸易冲击与城市化：作用机制

	(1)	(2)	(3)
	农村人均收入	城市人均收入	城乡收入差
金融危机	-0.003 (0.020)	-0.081*** (0.020)	-0.087*** (0.025)
工业化程度	0.119 (0.096)	-0.000 (0.001)	0.124 (0.109)
log(人口)	-0.040 (0.029)	-0.034 (0.034)	0.006 (0.039)
log(GDP)	0.006 (0.004)	0.006*** (0.002)	0.008* (0.004)
log(城市道路长度)	-0.009 (0.016)	0.017 (0.017)	0.026 (0.019)
常数	9.338*** (0.203)	10.103*** (0.175)	9.243*** (0.213)
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级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察值	2,898	2,951	2,847
R ²	0.928	0.927	0.912

说明：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图 7 进一步展示了金融危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逐年分布。以样本最早的三年 1998-2001 作为基准组，我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金融危机前没有显著区别，但在危机后有显著下降趋势。



说明：图中横轴代表年份。实线代表控制了上述控制变量、地级市和年固定效应之后的城乡收入差距在高贸易依存地区和低贸易依存地区的逐年差异。虚线为上下 95%置信区间。标准误在地级市层面聚类。

图 7 贸易冲击与城乡收入差：动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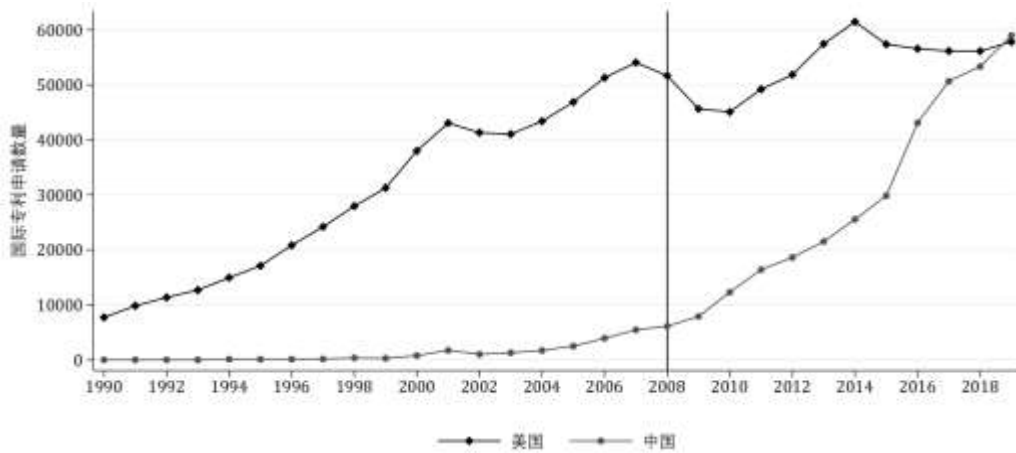
2.2 研究内容二：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创新支持行为的影响。

在研究内容一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对负面贸易冲击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应对行为也不可忽视。现有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文献，一般都假定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在此基础上讨论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落实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策出台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大量的刺激政策都出台于经济受到负面冲击时期。在经济发展遭受负向冲击时，面临绩效考核的地方政府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维持经济增长。政府的创新支持是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和创新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包括政府创新环境的建设、政府创新政策、直接参与等，因此通过对创新进行投入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促进产出是其中的重要政策选项。

为此，本节研究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上试图探究当外部的负面经济冲击发生时地方政府官员的内在激励影响公共政策实施的影响及传导渠道，量化其创新支持行为的经济效益以期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本节剩下部分分为两个部分：（1）对有关文献进行简要回顾；（2）介绍实证部分主要结果。

2.2.1 对外贸易及政府行为：文献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迅速发展。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06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不足1%。之后，中国的贸易量以每年14.65%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贸易总额已经达到4253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众多研究发现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但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显著的下降：就贸易总量而言，200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比上一年下降了16%；从贸易增速看，2008年后的进出口额年均增速仅为金融危机前的四分之一左右，直到2010年后才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速水平（国家统计局，2018）。并且这一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全球贸易量的平均下降水平12%（Chor和Manova，2012）。在进出口额急剧下降的背景下，结合现有理论本文应该预期企业的创新也将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图8展示了美国和中国每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变化。本文发现在危机之前美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一直维持稳定增长，贸易冲击后专利增速由正转负。2009年美国专利申请数量增速相较前一年下降8%。美国的创新在危机前后的变化符合上述理论的预期：在一个主要由市场决定创新的经济体中，创新在贸易冲击后会显著降低。但中国专利申请的变化则呈现出完全不同图景：贸易冲击后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依旧维持稳定增长，2009年专利数量的增速比危机前大幅提高17%。



资料来源：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19）

图8 美国和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变化情况

本文认为中国能够在贸易冲击后维持快速创新增速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冲击后推出的一系列创新支持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采取众多创新支持政策来应对贸易冲击。就中央来说，2009年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积极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鼓励企业增加研发和技改投资。中央财政 2009 年投入 1461 亿元用于科技研发，较前一年增长 25.6%。就地方政府来说，促进创新的政策可以分为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和直接参与创新活动两大类：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兴建产业园完善创新产业需要的硬件设施，也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提供良好的软件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对企业进行创新补贴、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措施直接参与创新活动。但是目前关于 2008 年危机前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变化情况的系统研究还不充分，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上述空白。

与本研究相关的主要是研究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与财政激励和地方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就晋升激励而言，中国的地方社会经济事务管理职权被下放给地方政府，但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始终被中央政府掌握，因此晋升激励会对地方政府不同维度的行为产生影响（周黎安，2004；Xu，201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晋升锦标赛”假说，该理论认为地方官员会围绕着经济增长进行政治竞争（Li and Zhou, 2005）。例如，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会通过廉价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企业投资，进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提升自己获得晋身的概率（梁若冰，2009）；还有一些学者发现地方政府会通过加大信贷投入的方式来支持企业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谭之博和周黎安，2015）。这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曹春方等，2014）和产能过剩等现象。就财政激励而言，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来自当地企业产出，这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生产的积极性（Qian and Weingast, 1997）。并且由于企业选址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争夺税基的经济竞争（吕冰洋、聂辉华, 2014）。因此在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也会运用各种行政和财政工具改善市场条件来吸引投资，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刘勇政等，2021）。但是，这些文献都假定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研究。相关文献并没有考虑在负面经济冲击发生时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试图就贸易冲击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支持政策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2.2 对外贸易及政府行为：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

实证部分将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来研究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在贸易冲击后的变化，模型设置如式（1）：

$$Innovation_{i,t} = \alpha + \beta High_i \times Post_t + \delta X_{i,t} + \sigm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表 3 展示了式（2）的估计结果，其中第 1 列仅考虑地级市和年固定效应，在第 2-4 列中本文逐步控制了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以及省级时间趋势。本文发现相较于贸易依赖度低的地级市，那些贸易依赖度高地级市在贸易冲击后政府报告中创新相关分词组合的频次增加了 2.06 次（第 1 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上述系数仍然是正向显著的（第 2 和 3 列）。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的高贸易依存地级市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创新行为可能存在不同的时间趋势。为此本文参照 Angrist 和 Pischke（2008）、Besley 和 Burgess（2004）的做法，在第 3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省级时间趋势进行解决。实证发现交互项系数为 1.15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第 4 列），这相对样本均值对应着 35.94% 的增长（1.15/3.2）。上述实证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冲击后高贸易依赖度地区地方政府支持创新的力度出现了明显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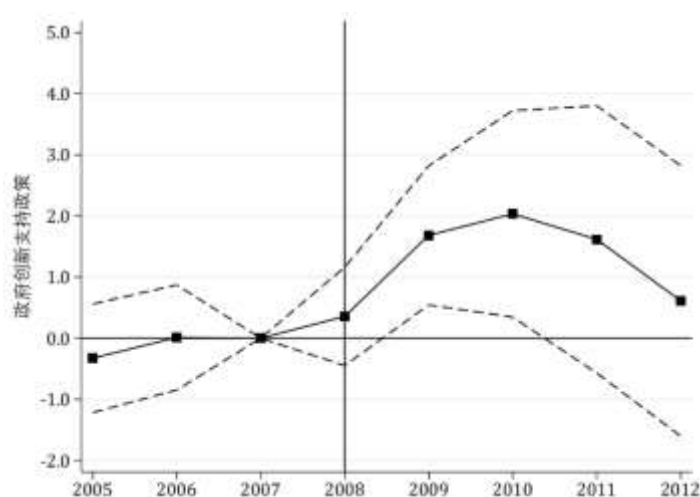
表 3 贸易冲击与政府创新支持政策

变量	政府创新支持政策			
	(1)	(2)	(3)	(4)
<i>High</i> × <i>Post</i>	2.0606*** (0.4752)	2.0228*** (0.4708)	1.6725*** (0.4452)	1.1479*** (0.4268)
人口 (log)		0.2555 (0.6831)	0.0994 (0.6101)	-0.2030 (0.5843)
GDP (log)		-1.1492 (1.4276)	2.2065 (1.5589)	1.1044 (1.4222)
工业化程度			-0.1770*** (0.0413)	-0.1230*** (0.0362)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0.0271 (0.0236)	0.0260 (0.0228)
地级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级时间趋势	NO	NO	NO	YES
R ²	0.6482	0.6485	0.6648	0.6910
观测值数量	1301	1301	1266	1266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如果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实施力度的变化的确归因于贸易冲击，那么在贸易冲击前贸易依赖度高的地区和低的地区的创新支持政策的实施力度应该不存在差异。图 3 展示了上述分析中 β_t 的估计值及 95%置信区间。本文发现在 2008 年前贸易依赖度高和低的两组地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本文使用 DID 的合理性。进一步，图 3 还能揭示出贸易冲击的动态影响：贸易冲击对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实施力度的正向影响在 2008 年后出现并逐步加大，并在 2010 年达到最大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随着 2010 年后中国对外出口的恢复并超过贸易冲击前水平后，贸易冲击的作用开始逐渐下降。



注：图中横轴代表年份。实线是加入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等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地级市、年固定效应、省级时间趋势之后的逐年贸易依存度估计值。虚线为上下 95%置信区间且标准误在地级市层面聚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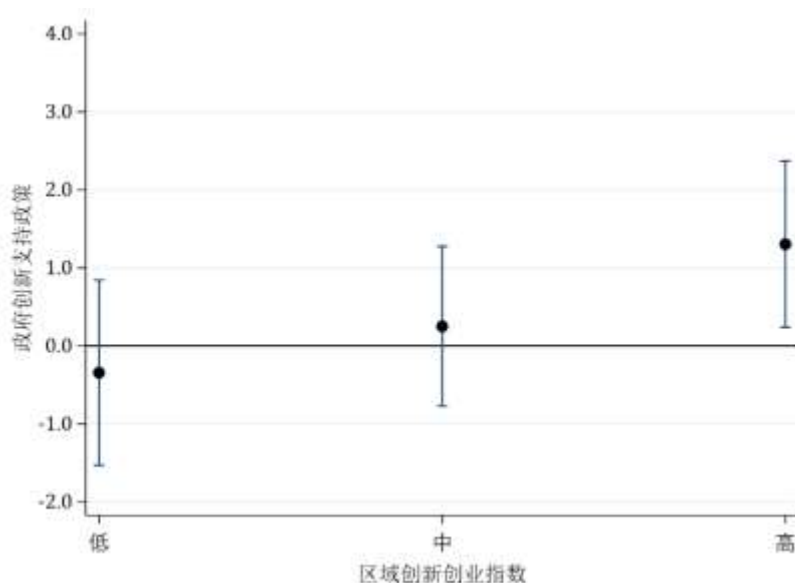
图 9 贸易冲击与政府行为：平行趋势假定

（三）贸易冲击作用的异质性

贸易冲击对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实施力度存在着异质性作用。本节将讨论贸易冲击作用在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下是否存在异质性。

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地方政府在进行政策选择时面临着不同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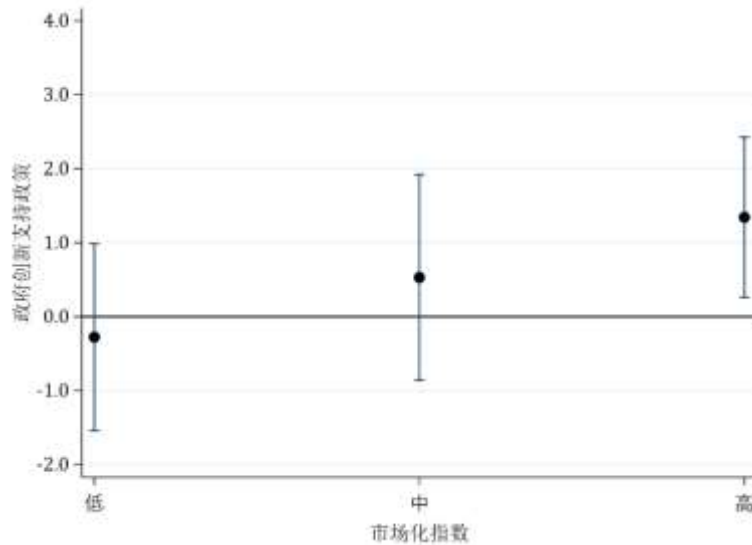
约束，因此导致贸易冲击的作用大小出现差异。根据现有文献，影响贸易冲击作用大小的地区性特征变量主要是区域创新创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本部分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对于区域创新创业水平，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构建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进行衡量（张晓波，2019）。具体而言，本文根据区域创新创业指数的大小将样本分成三组：低、中、高。图 5 展示了这些分类变量和贸易冲击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大小及置信区间。可以发现在区域创新创业水平越高的地级市，贸易冲击后地方政府创新行为提高的程度也越大。



注：圆点代表目标系数的点估计值，黑色竖线则代表 95%置信区间。标准误在地级市层面聚类。

图 10 区域创新创业水平与贸易冲击

对于市场化水平变量，我们参考樊纲等（2011）的做法计算得到了样本时期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计算得到的市场化指数越大，意味着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进一步地，根据市场化指数的大小我们将样本分成三组：低、中、高。图 6 展示了这些分类变量和贸易冲击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大小及置信区间。可以发现在区域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级市，贸易冲击后地方政府创新行为提高的程度也越大。



注：圆点代表目标系数的点估计值，黑色竖线则代表 95%置信区间。标准误在地级市层面聚类。

图 11 市场化水平与贸易冲击

2.3 研究内容三：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合作行为的影响。

研究内容二主要探讨了贸易冲击对单个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本节则侧重于讨论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间合作行为的影响。

既有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实现区域合作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国内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较少关注来自国际的因素。然而在贸易环境不确定下，当对外贸易受阻，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市场的动力就会降低，进而转向区域贸易以维持经济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在贸易冲击之后有激励更多地参与区域合作。具体来说，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地方参与区域合作可以帮助本地出口企业渡过金融危机，优化本地的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较低的地方参与区域合作则有利于提升本地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外贸相关产业来本地投资。由此，贸易冲击将促使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的两地政府开展更多的合作。

本节研究旨在检验贸易冲击是否会有助于地方政府间加强合作，但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这一合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厘清上述问题不仅对于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具有进一步的验证作用，同时有助于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探究政府间合作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作用机理，我们首先探究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协调的具体内容。在这部分研究中我们将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两种方

式进行分析。在了解政府间合作协调具体内容之后，我们尝试对其合作方向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本节剩下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有关文献进行简要回顾；第二部分介绍实证研究的主要结果。

2.3.1 对外贸易及政府间合作：文献回顾

在国际贸易相关理论中关于对外贸易与国内区域经济间关系的文献主要从贸易和分工两个方面展开。从贸易方面来看，核心问题在于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间的关系呈互补抑或替代。新贸易理论假设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为常数，此时企业出口或内销是相互独立的决策。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并不会影响国内贸易（Melitz, 2003; Chaney, 2008; Eaton et al., 2011）。近期文献将企业面临的产能约束考虑在内，认为企业在短期内很难调整生产，外需冲击会导致企业以内销替代出口（Vannoorenberghe, 2012; Soderbery, 2014; Ahn & McQuoid, 2017）。如果外需冲击改变了企业的产能约束条件，出口与内销之间也可能呈现互补关系（Berman et al., 2015）。综上，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企业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时如何调整生产成本。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其面临要素流动性较差、金融发展程度不高的市场环境（陆铭，2017；刘晴等，2017）。生产成本的调整较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来说相对不易，一旦外需市场发生变化，出口企业就更有可能转向内需市场。

从分工方面来看，核心问题在于对外贸易如何影响一国内部的产业分布。新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要素禀赋的作用，认为国际贸易会促使一国生产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因此对外贸易会导致产业在不同国家甚至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按雁行模式进行转移（蔡昉等，2009；张其仔，2015）。新经济地理学则强调规模经济的作用，认为企业在生产选址时需权衡市场潜力与运输成本。对外贸易会通过改变国内国际市场之间的相对潜力以及相对成本从而影响国内的经济地理格局（许德友、梁琦，2012）。综上，当一国对外贸易发生变化时，那些影响企业生产区位选择的因素，如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规模、营商环境等将重塑出口行业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在一国内部的转移和区域分布。

上述两支文献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贸易冲击如何影响我国区域经济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廓清地方政府在贸易冲击之后是否更愿意合作以及怎样合作。综合这些文献，我们认为金融危机对国内区域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出口受阻促使出口企业寻找内地市场，将出口转为内销，从而增加了国内的区际贸易（戴觅、茂锐，2015）；其二，出口行

业盈利能力受贸易冲击而下降的同时生产成本不变甚至增加，出口企业就面临本地转型升级或者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林桂军、黄灿，2013）。考虑到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Xu，2011；徐现祥等，2013；耿曙、陈玮，2015），贸易冲击带来这两方面的市场转变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我们预期贸易冲击会增加地方政府间是否合作的概率，这种合作更多体现在国内贸易量的增加及产业转移两个方面。

就是否合作而言，鉴于经济绩效依然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Li & Zhou, 2004；耿曙等，2017；王芳、陈硕，2020），地方政府在贸易冲击之后有激励更多地参与区域合作。一些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国际贸易规模经济可能放弃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有时甚至会采取一定的地方分割措施（陆铭、陈钊，2009）。当对外贸易受阻，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市场的动力就会降低，进而转向区域贸易以维持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地方参与区域合作可以帮助本地出口企业渡过金融危机，优化本地的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较低的地方参与区域合作则有利于提升本地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外贸相关产业来本地投资。由此，贸易冲击将促使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的两地政府开展更多的合作。就合作内容来说，鉴于我国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禀赋与政策权限能帮助出口企业应对转向内销或转移产业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贸易冲击之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将更多体现在促进国内贸易及产业转移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地方政府间通过共同搭建产销交易平台、互通优势资源与生产原料、衔接两地生产交易政策等多种渠道的合作，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交易成本并促进国内贸易量增长。地方政府间通过共建产业园区、联合召开招商引资推介会等合作能够降低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从而推动出口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重新分布。

综上，在经济高度分权且地方政府在调节经济资源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背景下，金融危机及贸易冲击对我国国内区域经济格局会带来重要影响，也会重塑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本文认为贸易冲击可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可能性并且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的双方更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

2.3.2 对外贸易及政府间合作：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来检验贸易冲击是否促进地方政府合作。估计结

果见表 4。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考察贸易冲击是否提高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结果如第（1）-（2）列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某省份当年是否与其他省份签订合作协议、签订多少项合作协议。核心解释变量贸易冲击由金融危机与贸易依存度两个变量交互项刻画。模型中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及固定效应。我们发现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比贸易依存度低的省份在金融危机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高 8.7%，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数量多 0.3 项。可见，贸易冲击促使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更积极地参与区域合作。接下来第（3）-（6）列的基准回归分析检验它们的合作伙伴更有可能是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还是贸易依存度低的省份，回归模型为式（1）。第（3）、（5）列仅控制了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第（4）、（6）列分别在第（3）、（5）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影响合作的其他因素。此外，考虑到不同省份在合作上可能存在不同的时间趋势，第（4）和（6）列还控制了省对的时间趋势（Angrist & Pischke, 2008; Besley & Burgess, 2004）。我们发现在加入了一系列影响区域合作的其他因素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变大且仍然显著。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在金融危机后的合作可能性增加 20.4%，合作协议数量增加 2.5 项。换言之，贸易依存度高与低的两省配对比同样贸易依存度（都高或者都低）的两省配对签订合作协议的概率更高、数量更多。这说明贸易冲击使得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更有可能与贸易依存度低的省份建立合作关系。

就其他控制变量来说，两省份人均 GDP 差异会显著提高合作概率、增加合作协议数量。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差异能促进地区间取长补短，发挥贸易的比较优势。财政自主度差异并不影响两省间的合作关系，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税收竞争而放弃区域合作。但国有经济比重差异显著影响两省政府间是否签订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数量，系数为正。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依赖所致。研究表明，转型期的我国地方政府有激励为保护承担了较多公共职能的国有企业而采取市场分割的立场（刘瑞明，2012；李艳、杨汝岱，2018）。因此国企占比越相似的两省市间更不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

表 4 贸易冲击与地方政府经济合作

被解释变量	是否合作		合作协议数		是否合作		合作协议数	
	(1)	(2)	(3)	(4)	(5)	(6)	(5)	(6)
贸易冲击	0.087***	0.325**	0.156*	0.204**	1.180***	2.469***	(0.357)	(0.225)
	(0.028)	(0.164)	(0.071)	(0.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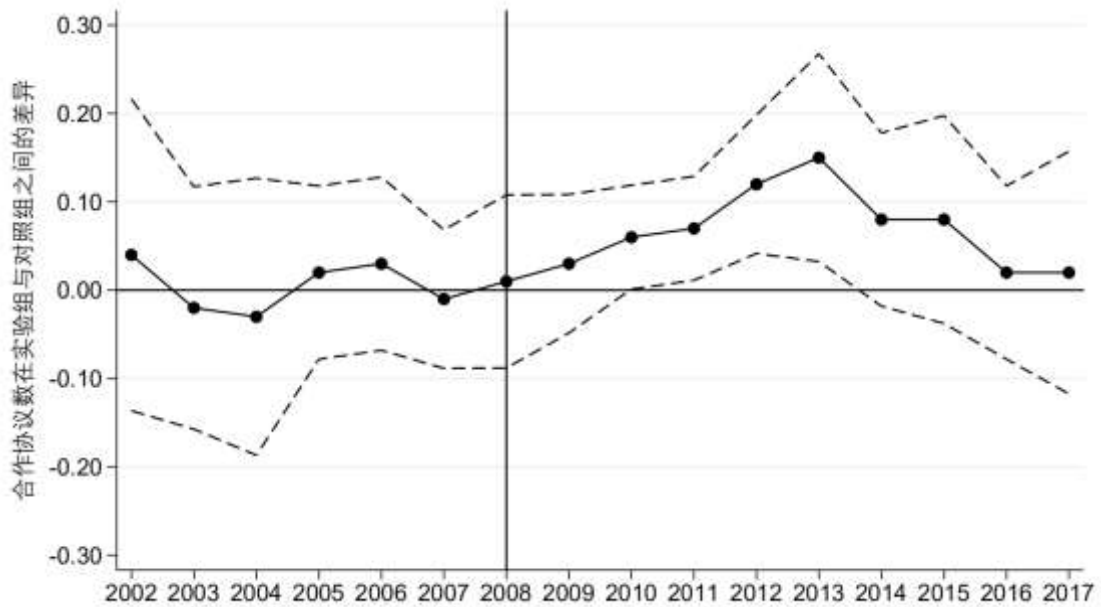
经济发展差				0.423***		0.512***
异				(0.078)		(0.156)
财政自主度				2.235		2.536
差异				(7.118)		(7.235)
国企比重差				0.045**		0.102*
异				(0.021)		(0.052)
观察值	558	558	8370	8370	8370	8370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省(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对哑变量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省对时间趋势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说明: (1) - (2) 列为面板数据, 观察值单位为省-年, 控制变量为经济增长率、财政自主度以及国企比重。
(3) - (6) 为面板数据, 观察值单位是配对省-年, 其中 (3) - (4) 列采用 Logit 模型估计, (5) 和 (6) 列采用 Poisson 模型估计。(1)、(3) 和 (4) 列的估计系数为边际作用。所有模型均包含常数项。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1$ 。

(二)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上述 DID 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 如果合作的变化的确归因于贸易冲击, 那么在金融危机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应该不存在差异。为检验该假定, 我们把贸易冲击逐年打开。这能够让我们检验两组地区在贸易冲击前是否存在差异, 并且也可以观察到贸易冲击对合作的逐年动态影响。

图 12 展示了 DID 估计结果 β_t 的估计值及 95% 置信区间。我们发现 2008 年前两组样本的合作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 DID 设置合理。进一步地, 图 2 还能反映出贸易冲击的动态影响。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强度在 2008 年后有显著提升, 其作用大约持续了 5 年时间: 在 2013 年之后才有下降趋势。



说明：图中横轴代表年份。实线是控制了省、年固定效应及省时间趋势之后的合作协议数的估计值。虚线为上下 95%置信区间且标准误在省层面聚类。

图 12 贸易冲击与地方政府间经济合作：平行趋势假定

（三）合作方向：谁主动发起合作？

上述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后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的两省份更有可能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需要廓清的问题是合作方向，即哪些省份主动发起合作？我们预期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由于受贸易冲击的影响更大，更可能成为区域合作的主动方。表 5 考察了贸易冲击对贸易依存度较高省份主动寻求的合作行为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的观察单位仍然是省份配对。第（1）和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是否**主动**与某配对省市签订合作协议、签订合作协议的数量。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变量与固定效应后，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贸易冲击提高了贸易依存度较高省份主动向贸易依存度较低省份寻求合作的概率，增加了贸易依存度较高省份主动向贸易依存度较低省份寻求合作所签订的协议数量。该发现验证了贸易依存度高的省份主动寻求合作的研究假设。

表 5 贸易依存度高省份主动寻求的经济合作

被解释变量	是否合作	合作协议数
	(1)	(2)
贸易冲击	0.203*** (0.060)	0.338* (0.185)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观察值	8370	8370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对哑变量	有	有

说明：（1）列采用 Logit 模型估计，（2）列采用 Poisson 模型估计。（1）列估计系数为边际作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1$ 。

（四）合作内容

最后本节检验：贸易冲击是否增加地方政府在国内贸易及产业转移两个方面的合作。为此，我们根据地方政府间签订合作协议的内容重新编码生成了地方政府间贸易合作及产业合作这两类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包括配对省份间是否签订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数、是否签订产业合作以及产业合作协议数。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是贸易冲击，同时模型中也控制了其他变量与固定效应。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第（1）和（2）列关注地方政府间在贸易方面的合作，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贸易冲击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间开展贸易方面的合作。第（3）和（4）列关注地方政府间在产业方面的合作，两者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只有第（3）列的估计系数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 的统计检验，第（4）列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些微弱的证据表明贸易冲击有可能加强地方政府间在产业方面的合作。总体来看，我国地方政府间受贸易冲击影响更容易在促进区域贸易方面开展合作，而在产业方面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合作。这可能与产业转移过程涉及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分摊更加复杂有关，故而双方不容易形成共识。

表 6 贸易冲击与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内容

被解释变量	是否有贸易合作	贸易合作协议数	是否有产业合作	产业合作协议数
	(1)	(2)	(3)	(4)
贸易冲击	0.347** (0.181)	1.844*** (0.063)	0.086* (0.049)	0.894 (1.269)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8370	8370	8370	8370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对哑变量	有	有	有	无

说明：（1）和（3）列采用 Logit 模型估计，（2）和（4）列采用 Poisson 模型估计。所有模型均包含常数项。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1$ 。

3. 研究工作主要进展与结果

该部分对本项目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重要结果、关键数据及研究价值进行说明。

主要研究进展及结果方面：

第一，本课题实证检验了贸易冲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课题基于全国 1998 至 2013 年 2851 个县的面板数据，以 2008 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并基于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贸易冲击对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我们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我们的量化分析发现负面贸易冲击降低了 0.44 个百分点的城市化增速，贸易冲击能够解释城市化率增速变化的 17%，上述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城市化的因素后依然稳健。其次，贸易冲击对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异质性影响：影响大小随地区贸易依赖度的增大而增大。最后，我们探究了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我们认为贸易冲击通过降低城市居民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最终降低城市化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期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项变化：其一是经济体内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其二是外部贸易摩擦频发，因此我们的估计仅为贸易不确定背景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下限。

第二，本课题实证检验了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创新支持行为的影响。

本课题收集了 332 个地级市从 2006 年到 2013 年的工作报告结合相应的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上探究了当外部的负面经济冲击发生时地方政府官员的内在激励影响公共政策实施的传导渠道，揭示出中国式产业政策落实的内在机理。通过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我们证明贸易冲击发生后，在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的推动下高贸易依赖度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创新促进型政策的支持力度会显著高于低贸易依赖度地区。同时，贸易冲击的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区域创新创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实证部分，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方法进行验证。实证结果发现该作用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政府创新支持政策的因素、采用不同创新支持政策衡量指标后依然稳健。就具体措施而言，促进企业改制以建立良好的软件制度保障以及直接对企业进行创新补贴是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危机促进创新所采用的主要措施。

第三，本课题实证检验了贸易冲击对地方政府合作行为的影响。

本课题构建了 2000 至 2017 年每两省间配对的省级政府合作数据，实证研究了

贸易冲击如何影响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我们发现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的两省签订经济发展合作协议的概率，增加了其签订合作协议的数量。进一步分析还表明该作用主要体现在贸易依存度较高省份主动发起的合作。此外，对合作内容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显示贸易冲击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在贸易方面开展合作，而非主要通过产业转移方面的合作实现。

关键数据积累方面：

课题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数据库，其中包括：（1）宏观层面：1998-2014 年的省市县级经济发展数据、1998-2013 年的省市县级财政收支及转移支付数据、1998-2013 年县级灯光数据、2005-2013 年地级市政府创新支持数据、2000-2018 年省级政府间合作数据、历次分县人口普查统计数据；（2）微观层面：1998-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 2002-2020 年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价值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与应有之义。在这一总体布局战略目标指引下，本课题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地方政府对区域潜在经济发展的合理规划。当前针对贸易与城市化的研究多为理论文献，有限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跨国数据，这使得我们无法廓清贸易对国家内部城市化动态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在分析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时，通常将其视为整体开展研究。更重要的，现有文献并没有将贸易的内生性视作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使得从中得出的结论需要谨慎对待。而本课题则将重点放在考察其对我国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和现有研究相比，本课题结论有助于廓清贸易冲击对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异质性，这将为政策制定者在贸易不确定背景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预期纳入决策考察范围从而做出合理的事前规划。

第二，本课题的发现凸显出在外部贸易不确定背景下，在内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时，顶层设计及地方区域协同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行为绝不仅仅是处理地方政府辖区内部的事务，也涉及到上级政府出台跨区域的治理对策。对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考察是理解转型期社会经济特征的重要视角之一，地方政府为应对负面贸易冲击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尚无严谨的实证研究分析其行为变化。鉴于近年来国际保守思潮增加了国际贸易上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支持实现区域高质

量发展、通过政府间合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廓清国际贸易对我国地方政府对于创新支持行为以及政府间合作行为的影响就具有了现实迫切性。我们通过系统搜集地方政府上述信息，对其做出系统评估。

第三，在当前保守思潮复兴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形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十四五”时期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道路是我国区域发展的主基调。廓清贸易冲击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应对这些冲击，本课题的发现为我国在保守思潮复兴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来推动国内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政策思路。

4. 存在的问题、建议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情况说明：项目执行期间由于新冠疫情加剧，严重影响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课题组成员未能按计划线下去国内更多高校参加学术会议陈述学术成果。同样受到疫情影响使得课题组成员未能展开全面的田野调查，日后将在这方面继续完善。

5. 参考文献

Ahn, J., & McQuoid, A. F. (2017). Capacity constrained exporters: Identifying increasing marginal cost. *Economic Inquiry*, 55(3), 1175-1191.

Angrist, J. D., & Pischke, J. S. (2008).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sley, T., & Burgess, R. (2004). Can labor regulation hinder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1), 91-134.

Berman, N., Berthou, A., & Héricourt, J. (2015). Export dynamics and sales at ho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6(2), 298-310.

Chaney, T. (2008). 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4), 1707-1721.

Chor, D., & Manova, K. (2012). Off the cliff and back? Credit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7(1), 117-133.

Desmet, K., & Henderson, J. V. (2015). 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ries. In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5, pp. 1457-1517). Elsevier.

Eaton, J., Kortum, S., & Kramarz, F. (2011).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 *Econometrica*, 79(5), 1453-1498.

Gollin, D., Jedwab, R., & Vollrath, D. (2016). Urbanization with and without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 35-70.

Harris, J. R., and M. 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126-142.

Henderson, J. V., & Kriticos, S.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 system of citie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0, 287-314.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3), 483-499.

Lardy, N. R. (1995). 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1065-1082.

Li, H., & Zhou, L. A.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1743-1762.

Liu, X., Burridge, P., & Sinclair, P. J. (2002).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34(11), 1433-1440.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Qian, Y., & Weingast, B. R.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83-92.

Soderbery, A. (2014). Market size, structure, and access: Trade with capacity constraint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0, 276-298.

Vannoorenberghe, G. (2012). Firm-level volatility and expor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6(1), 57-67.

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1076-1151.

Yao, S. (2006). On economic growth, FDI and exports in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38(3), 339-351.

蔡昉、王德文、曲玥，2009：《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经济研究》第9期。

曹春方、马连福、沈小秀：《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J]，《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4期，第1415-1436页。

戴觅，茅锐，《外需冲击、企业出口与内销：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5年第1期。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201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耿曙、陈玮：《政企关系、双向寻租与中国的外资奇迹》，《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许德友，梁琦，《贸易成本与国内产业地理》，《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1卷第3期。

国家统计局，2018：《中国统计年鉴 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

李艳、杨汝岱：《地方国企依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与供给侧改革》，《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梁若冰：《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J]，《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1期，第283-306页。

林桂军，黄灿，《出口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国家贸易问题》，2013年第12期。

林毅夫、李永军：《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期，第779-794页。

刘晴，胡甜甜，邵智，《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内外销关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运输成本的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刘瑞明：《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理论与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刘勇政、吕冰洋、李岩：《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税制的激励作用》[J]，《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第136-150页。

吕冰洋、聂辉华：《弹性分成：分税制的契约与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7期，第63-78页。

陆铭：《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4期。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发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谭之博、周黎安：《官员任期与信贷和投资周期》[J]，《金融研究》2015年第6期，第43-50页。

张晓波：《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M]，2019年。

王芳、陈硕，《官员激励与政府支出效率：来自地级市的证据》，《经济学报》2021年第8期。

张其仔，《中国能否成功地实现雁阵式产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6期。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第33-40页。